



「红星」照耀中国八十年

曲鹏

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首个中译本以《西行漫记》的名字在上海出版,80年来,这本书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在我们理解现实、追溯历史本源的今天,它也在期待着新一轮的解读。

>> 80年前,《西行漫记》靠“众筹”出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关于革命与战争的问题,于1936年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探寻红色中国,历时四个月,遍访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等,以及红军普通战士,寻访当地的老百姓,用客观又不乏激情的语言,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革命,这就是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1937年3月,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一时轰动了世界,中国读者却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有此书。11月,斯诺来到上海,见到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并向他赠送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读完后,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让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用“复社”的名义在上海翻译出版了第一个全译本。此书据英文版译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由于缺少印刷资金,胡愈之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预先发售的购书券被抢购一空,在当年2月到11月印行了四版,在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集聚地引起轰动。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有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奔赴延安。

>> 40年前,董乐山译本使读者看到历史真相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定名为《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故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这两个版本均据1938年7月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的修订增补版译出,所以与胡愈之“复社”版有所出入,在内容上也多出《旭日上的暗影》,这一章着重介绍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和对中国抗战前途必然胜利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使《西行漫记》在中国国内渐趋冷落,仅在1960年2月为欢迎斯诺访华,三联书店依据“复社”版印行一次,印数有限,只作为“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及至“文革”期间,《西行漫记》被禁。

“文革”结束,《西行漫记》重获新生。1979年12月,市面上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重要译本: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和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其中董乐山译本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章节,对英文版中某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等拼写错误也做了一些必要校正。董乐山译本如实记述了当时众多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对于纠正“文革”中对这些人的污蔑起到了巨大作用。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

>> 今天,《红星照耀中国》收入语文书

董乐山译本如今已成为经典名篇,各家出版社再版都依据这一版本。“红星”照耀中国几十年后,再度掀起热潮,2016年7月,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至今销量超过300万册。

201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片段被选入教育部编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在前不久举行的“纪念《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以他的目光观察世界,作者的角度、眼光、语言都别具一格。他对共产党人由同情到了解,对人物的描写有一种人性的关怀,写出了共产党领导人独特的人格魅力,通过一些细节让读者亲近了革命领袖,感受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气度,体现了为理想奋斗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本书今天读来还有新鲜感,对讲好中国故事有借鉴意义。

作家曹文轩认为,《红星照耀中国》作为西方记者的观察与采访,其魅力来自真实,真实性在作者的表述中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呈现了革命的本真状态。



1937年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复社”1938年版《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79年版《西行漫记》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

【领读经典】

司马迁写《史记》,不以成败论英雄

领读人 郑训佐

《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记》,在根本上并不是因为它有本纪、世家这样的名目,而是它体现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它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传记,囊括了帝王将相、平民百姓、智者、商人乃至巫婆、神汉等各色人物,只要对当时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都会为他们立传。我所说的社会影响力,也许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也许是一种负面的效应。比如吕后这个人,司马迁对她极度反感。作为一个女人她坏得不能再坏,她把刘邦宠爱的戚夫人鼻子削了,眼睛挖了,然后放在粪坑里面。司马迁非常讨厌她,但依然把她列入本纪,因为吕后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种很强大的负面力量,司马迁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吕后的作用等同帝王,因此把她列入本纪。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为中心,并且以复杂的标准去定位,因此《史记》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历史的真实。这很不容易。《史记》里有很大篇幅关乎汉代的当代史,其中有些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刘邦,他年轻的时候曾做过亭长,还是个流民,整天好逸恶劳。他的父亲就对他:“你不像你二哥会干活。”刘邦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刘邦的岳父,也就是吕后的父亲曾大摆筵席,招待宾客。每位宾客的位置与他的礼金是相对的:礼金高,位置就尊;礼金低,位置就差。他谎称自己礼金高,实际上一文不名。萧何大概知道刘邦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两个人互相配合,欺骗了吕公。吕公也是慧眼,一下子就相中了刘邦,让他做女婿。刘邦这个人又很狭隘。狭隘到什么程度?他父亲曾经批评他不如老二能干活。当刘邦做了皇帝,曾大摆筵席招待群臣,声势浩大,一派皇家气象。他“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他父亲听后无话可说。连与父亲的口舌之争他都要报复,你说他狭隘不狭隘?刘邦还冷酷。项羽抓住刘邦的父亲,打算把他烹了。刘邦却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心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这段话表面上来看是陷项羽于不义,但毕竟这段话的中心人物是刘邦的父亲,这种话是绝对不能说的,而刘邦就能说出来。刘邦溃逃,路遇自己的一对儿女,将士把孩子拉到车上,但他为了使自己的车跑得快,三番五次把孩子推下车去,都是好心的将士把孩子拉上车的。“为天下者不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不会顾及亲情,刘邦的身上就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气质。当然,刘邦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他有忍让的一面,有宽容的一面,有能够虚心纳谏的一面,在关键时刻克制住自己欲望的一面。这些司马迁都写了。优点好写,可这种情况怎么写?要知道

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朝最鼎盛的时期,汉武帝与刘邦生活的年代相隔不远。司马迁却都做了忠实的记录。

再如项羽,他是司马迁非常喜欢的人物。他把项羽这个人写得非常立体。他写了项羽刚的一面,柔的一面,写他爱名马,爱美人,但是绝对没有因为对项羽有所偏爱而忽略了他的人格缺陷。《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对项羽进行评价时,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历史喟叹。项羽始终在埋怨:这不是他的错误,是老天爷要亡他,也就是天数。真的是天数吗?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为我们展现了项羽由崛起、到衰落再到彻底失败的历史过程。比如巨鹿之战,项羽的果敢果决绝对不亚于鸿门宴时的刘邦。但在鸿门宴中,项羽已经非常失败了,粗疏麻木,甚至不能用“妇人之仁”来形容,他甚至觉得这个人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鸿门宴已潜在地留下了垓下之战项羽仓皇失败的影子。而这时的刘邦,相当敏感,相当果断。与刘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项羽轻信别人的谗言,又把谣言的散布者出卖了。而刘邦听了以后,立刻杀了曹无伤。这种对照写法,是司马迁的史家笔调。到了垓下之战,他侧重写项羽之所以成为悲剧性人物的关键场景,相当感人。所以,司马迁挖掘得很深,把项羽写得很立体。

司马迁不以成败作为考察历史人物的标准,这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精神。不管是对刘邦的考察,对项羽的考察,还是对陈涉的考察,对孔子的考察,乃至对酷吏张汤的考察,都是如此。说到底,就是不以现实的成败论英雄。司马迁受儒家的影响很深,儒家价值体系中超越功利的人格几乎无处不在。

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两部书。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部书应该是现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最优秀的传记之一。我个人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相提并论的。另外一部就是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

(本文选自《领读经典》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